



CHINA NEWS DIGEST — CHINESE MAGAZINE (CND—CM)

• — • — • 中国新闻电脑网络 (CND) 主办 • — • — •

—— 增刊 第七三六期 ——
(二〇一〇年一月十九日出版)

本期目录 (zk1001d)

【读书笔记】	张春桥宦海沉浮与“文革”悖论	董国强
【人物传奇】	杨宪益传 (节选三)	雷音
【当事者说】	蹩脚的工程师和眼花的老祖母	叶志江
【往事如烟】	大学回忆录——我被揪出来了	金渝

小启：本期通讯所刊载的材料已经全部增补到网上《文革博物馆》“最新展出厅”及各有关“展厅”，欢迎前往参观。

文革博物馆》网址：<http://museums.cnd.org/CR>

欲订阅本刊《文革博物馆通讯》请致函 cnd-info@cnd.org 获取订阅资讯。

来稿请投寄 tougao@cnd.org。请在 subject 中表明 CR 字样。

【读书笔记】

张春桥宦海沉浮与“文革”悖论

• 董国强 •

作为一个研究中国现当代历史的中国人，拿一本外国人三十年前写的有关中国现当代历史的小册子说事，内心多少有点感到别扭。但我要介绍的这本书确实大有来头。

这本书的作者安德鲁·维尔德是目前在美国学界十分活跃的老资格“中国问题研究”专家之一。他1981年从当时的“中国问题研究”重镇密歇根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其后曾在哥伦比亚大学、哈佛大学、香港科技大学任教。1997年应邀加盟斯坦福大学，现任斯坦福大学社会学系教授、系主任，兼任斯坦福弗里曼·斯普格里国际问题研究院亚太研究中心主任、斯坦福大学文理学院国际区域比较研究分部主任等职。他早年的学术研究兴趣主要集中于“文革”时期的民众政治参与问题，近二十年来则更多地关注于市场化改革的影响和中国社会转型方面，代表作有《中国乡村的“文化大革命”：空间概念、时间维度与人际关系影响》、《党内精英与中国发展》、《当代中国转型研究》、《历史学视野下的中国“文化大革命”》、《中国政治的不确定性和民众政治选择：北京红卫兵派性问题起源》等。他目前在斯坦福弗里曼·斯普格里国际问题研究院主持的研究项目包括“中国转型经济中的政治与所有权关系”、“中国经济转型的社会学考察：组织结构、社会分层与社会流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村的私有化与精英流动”、“中

国农村的政权机构、亲缘关系和家庭财富”等，近期即将发表的重要论著还包括一本写作时间长达二十多年的《北京的红卫兵运动》。

《张春桥和上海一月革命》一书，是安德鲁·维尔德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习作，当时被列入“密歇根中国研究论文”出版计划，于1978年由密歇根大学出版社出版。这本小册子虽然篇幅不大（全书约一百五十页，其中正文约八十页，翻译成中文大概只有四十页左右），但对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乃至毛时代的中国政治确实有不少独到的见解，值得真正关心这些问题的人读一读。

首先，这本书以“文革”时期位高权重的风云人物张春桥和“文革”运动的阶段性标志事件上海“一月风暴”为研究论述的切入点，选题视角颇具匠心。通过深入考察以张春桥和“中央文革”为代表的中央高层以及以曹荻秋为代表的地方领导层的政治活动，可以充分揭示当时中国政治的组织形态、政治沟通方式以及特定的个人在组织系统中的角色分工对其政治抉择的决定性影响。而对上海工人造反运动成因和特点的全面透视，则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当时中国社会内部的各种潜流，明了群众造反组织出现、分化与矛盾冲突的社会根源，以及底层民众运动与上层精英决策之间的复杂互动关系。就笔者所知，类似这样采用多重视角、以个案研究为基础、最后又能上升到理论层面探讨“文革”运动的研究论著并不多见，国内学者中对此类研究路径有所了解的更是凤毛麟角。

其次，作为一项实证研究成果，这本书以较为翔实的资料为基础，条分缕析，推陈出新，颠覆了当时西方学界对“一月风暴”乃至整个“文革”运动的一些传统认知。我个人感受较深的是以下几点：

第一，很多西方学者从“社会冲突”理论模式出发，认为“文革”本质上是一场底层民众反抗官僚体制的社会运动。因而在他们看来，上海“一月革命”的出现乃是以曹荻秋为代表的上海旧市委一班人为了维护现行官僚体制和自身既得利益，千方百计镇压群众运动的必然结果。

维尔德通过追溯曹荻秋和张春桥的政治成长史，指出曹荻秋等人在著名“毛派”人物柯庆施麾下不断升迁的事实，表明他们与张春桥一样，长期以来一直是党内“左倾”路线的拥护者和追随者。这种政治姿态在“文革”初期并没有发生改变。1966年5月至8月间上海声势浩大的“文化批判”运动——批判对象包括老资格“革命音乐家”贺绿汀、著名历史学家周谷城、著名京剧表演大师周信芳等人——就是由上海市委发动的。上海第一个红卫兵组织的出现，以及轰轰烈烈的“破四旧”运动，也与曹荻秋等人的大力支持有关。

曹荻秋等人对“文革”运动的困惑与疏离，始于群众运动由文教领域向社会各界蔓延以后。1966年11月前后，中央高层在如何理解“抓革命”与“促生产”的关系问题上出现了微妙的分歧：以周恩来等人为代表的“稳健派”强调“抓革命”的终极目的在于“促生产”，因而他们主张对正在兴起的工人运动加以必要的限制与疏导，以保障正常的生产和社会秩序；而以“中央文革”为代表的“激进派”则认为“抓革命”是当下运动的重点，只有彻底“批倒批臭”形形色色的“修正主义”路线，工农业生产和其他各项社会主义事业才有可能实现“全面跃进”。来自中央的两种不同声音，使身处工作一线的曹荻秋们无所适从。从工作职责和经验常识出发，他们更倾向于接受周恩来等人的主张，然而北京市委彭真等人被清洗的教训，又使得他们不敢挺身而出干预群众运动，怕被戴上“镇压群众运动”的帽子。因而在实际工作中，他们先是努力在中央确定的两个相互矛盾的目标之间寻求某种平衡点。而当群众运动在极“左”路线的煽动下变得无可理喻时，他们选择了不置可否、消极观望的姿态。由此可见，如果要追究责任，上海市委一班人的责任底线是“政治不作为”，而不存在所谓“抵制、镇压群众运动”的问题（至于为什么有人要给他们戴上这顶帽子，看了下文大家自然明白）。

第二，批判“经济主义”是1967年初上海“文革”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很多西方学者认为，“经济主义”是旧市委一班人为了保住自己的权力、颠覆“文化大革命”而采取的破坏性策略。维尔德对此也提出了不同看法。他重点考察了当时中国的社会经济结构，指出了导致“经济主义”的两个重要原因：

首先，从一个较长的时段来看，所谓“经济主义”的出现与“大跃进”失败以后国家用工制度的变化有关。在1960年代初“经济调整”期间，上海不少厂矿企业一方面动员部分在职员工下放农村和支援边疆，另一方面又从农村招收了大量临时工、合同工进企业工作。当时的舆论宣传强调，这种用工制度改革可以达成以下三个积极成果：第一，临时工、合同工的工资和福利水平大大低于正式工，因而大量使用临时工、合同工有利于企业降低生产成本，增加企业对国家的贡献；第二，临时工、合同工主要来自农村，因而大量使用临时工、合同工意味着国家宏观社会分配模式的重大改变，是国家反哺农民、反哺农业的有效手段之一；第三，动员富有技术专长和生产经验的企业职工“下放”和“支边”，可以促进农村和边远地区工业发展，改善中国社会的经济结构，加速工业化和城乡一体化的进程。然而在具体实践中，这个政策的弊端很快便显露出来：第一、临时工、合同工与正式工“同工不同酬”，严重违背了社会主义的“平等”原则，人为地造成了工人阶级内部的阶层分化。“文革”期间群众组织之间的派性冲突与此有很大关系；第二、临时工、合同工收入水平偏低，难以维持正常的生活开支，因而有增加收入的潜在要求；第三、被动员“下放”和“支边”企业员工，则往往因为技术专长得不到发挥、经济收入大幅下降、两地分居、水土不服、生活不习惯等原因，有返回上海原单位就业的潜在要求；第四、企业现有的正式工害怕自己有朝一日也被“精简”，因而也对党、政府和企业有所不满。

其次，上述各种潜在的要求转化为破坏性的政治行为，与“中央文革”积极推行极“左”路线有关。江青在1966年12月26日代表中央接见全国临时工、合同工群众组织代表时，不负责任地将用工制度的变化归咎于刘少奇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表示支持临时工、合同工就“同工同酬”问题向劳动部门交涉。同日，“中央文革”控制下的《人民日报》还发表社论《迎接工矿企业文化大革命的高潮》，要求各地厂矿企业领导层积极支持群众运动，不得以工人擅自离岗外出“串连”、“上访”为由扣发他们的工资和奖金，并责成各单位支付外出串连、上访人员的差旅费。江青等人作出以上表态，显然是想利用部分工人群众的不满情绪制造事端，达到他们自己篡党夺权的目的。然而令他们没有想到的是，上述舆论导向造成的客观后果是“无政府主义”和“经济主义”在全国范围的严重泛滥。从上海的情况看，不但临时工、合同工群体的各种经济要求有增无己，而且包括正式工在内的其他社会阶层也开始以离岗、上访为要挟，提出增加工资、增加福利、改善住房条件等经济要求。“下放”和“支边”的工人也返回上海，提出经济补偿和回原单位复工复职要求。而此时上海市委领导人则被极“左”路线束缚住手脚，无法抗拒来自各方的经济要求，只好“群众要什么我们给什么”、“群众要多少我们给多少”。由此造成的灾难性后果是：银行现金大量流失，直接危及工农业生产和金融安全；大量工人离岗离职加入争取经济权益的街头运动，导致生产停顿、交通瘫痪，其中外贸方面造成的恶劣影响尤其严重；大量现金一下子涌入市场，打破了原有的供求关系平衡，导致市场消费品短缺和价格上扬。

由此可见，上海“经济主义”风潮的出现并不是曹获秋们操纵群众运动的结果，而是“文革”前社会经济体制弊端和“中央文革”推行极“左”政策的产物。由此造成的灾难性后果，也不应该由曹获秋们负责。

第三，许多西方学者认为：上海“一月革命”是革命造反派反对现行官僚体制的一个胜利，“上海公社”体现了张春桥等“激进派”的乌托邦理想。为了澄清上述错误观点，维尔德在相

关叙述中突出强调了以下几点事实：一，1967年1月初张春桥返回上海的使命不是鼓动“革命”，而是重建经济和社会秩序。之所以如此，主要是因为上海的无政府状态和众多外商的强烈抗议引起中央领导层的高度关注，连一直持极“左”姿态的“中央文革”也认为有必要加以干预。二，鉴于上海市委已经完全瘫痪，张春桥在上海的中心任务显然不是从旧市委手里“夺权”，而是如何将失控的群众运动重新置于控制之下。三，张春桥到上海以后所采取的行动，无一不与上述意图有关：他策动《文汇报》、《解放日报》“夺权”事件，目的在于牢牢控制“话语霸权”，以便形成新的舆论导向；他对群众组织加以重新整合，建立以“工总司”为核心的“反对经济主义指挥部”、“抓革命、促生产联合指挥部”，目的在于借这些御用群众组织之口，提出整顿社会经济秩序的种种措施；他发起成立临时权力机构“上海公社”（后来经毛泽东批示改为“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目的在于借助这个组织载体更有效地行使权力，协调当地驻军、公安民警和群众组织的行动。第四，鉴于张春桥的使命与许多工人群众组织的政治诉求完全相左，张春桥领导下的“上海公社”严重缺乏群众基础，其支持者大约只占到工人群众的四分之一。如果不是得到中央的支持，这个权力机构一天也存在不下去，这可能是对“群众胜利论”和“乌托邦理想论”的最有力反驳。

既然所谓“一月革命”的真相如上所述，为什么那么多西方学者会对此产生严重误解？维尔德对此的解释是：上述现象的形成与1967年初张春桥控制下的上海传媒对历史真相的刻意歪曲有关。而歪曲历史真相的目的，在于维护“中央文革”一贯正确的形象，摆脱由于其愚蠢盲动造成严重后果所应承担的责任。换言之，为了避免极“左”政策的突然改变所造成的尴尬处境，张春桥和“中央文革”有意把上海市委一班人拉出来当替罪羊，似乎上海“经济主义”问题和“无政府”状态的形成是曹荻秋等人“对抗中央指示”、“破坏群众运动”的结果。这样一来，原本属于“纠偏”性质的一系列举措便被冠以“革命”之名。

除了上述三点关于历史事实的辨析澄清之外，维尔德对张春桥个人政治表现的分析论述也很独到。

纵观上海“一月风暴”的全过程，我们不难发现张春桥先后扮演了两种截然不同的角色：“放火者”和“灭火者”。说他是“放火者”，是因为“文革”群众运动的发生与此前若干年意识形态宣传的不断升温紧密相关，而张春桥和“中央文革”一班人正是这种极“左”意识形态宣传的幕后操作者。其次，在上海工人运动的发展过程中，1966年11月间发生的“安亭事件”至为关键。张春桥在代表中央处理“安亭事件”时，违背了周恩来等人的既定方针，同时不顾华东局和上海市委的反对，擅自与“工总司”代表签署“五项协议”，因而对上海政治、经济和社会局势的不断恶化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说他是“灭火者”，是因为他在1967年1月奉派返回上海后，转而强调劳动纪律，千方百计地弱化和转化工人运动的能量，并以铁血手段镇压了各种反对势力，从而使上海局势迅速得到控制。而且在此后近十年间，张春桥主政下的上海比其他许多省市要稳定得多。

作者基于张春桥的上述表现指出：在探讨中国政治问题时，认为“激进派”一定专注于“动员”和“破坏”，“稳健派”一定专注于“秩序”和“生产”，是一种僵化陈腐的观点，会产生严重的误导。张春桥在上海“一月风暴”前后的角色转换，很好地解释了中国政治中“组织结构”与“政治冲突”的关系。也就是说，一个政治家的政治主张往往与他在组织系统中扮演的角色有关。当他扮演的角色发生变化以后，他的政治主张也会发生相应的改变。举例来说，张春桥和曹荻秋在“安亭事件”等问题上的分歧，主要是中央领导层与地方领导层之间、主管意识形态的官员与主管经济工作的官员之间的角色差异造成的。当张春桥全面接管上海工作以后，很快意识到曹荻秋们所面临的种种现实问题。因而在此后的工作中，张春桥基于其特有的双重身份，与“中央文革”其他人的政治观点有时一致，有时相左。例如在著名的武汉“七·二〇事件”发生后，张春桥作为“中央文革”的一员，并不反对《红旗》杂志发表“揪军内一小撮”

的社论。但是在他直接管辖下的上海，他非但不鼓励群众组织冲击军队，反而千方百计加强与军方领导人廖国政之间的友好合作关系。

最后作者还指出，张春桥在上海“一月风暴”期间的角色转换，显然会导致各种政治势力对他的反感甚至敌视。开头他因扮演“放火者”的角色，得罪了上海各级党政领导干部，以及与这些领导干部政治利益较为一致的“保守派”群众；后来又因扮演“灭火者”的角色，得罪了绝大部分“造反派”群众。在这种情况下，张春桥依然能够树立权威，行使职权，归根结底在于毛泽东的宠信和他个人娴熟的政治手腕。然而从长远的观点看，这样的权力基础并不稳固。毛泽东去世后不到一个月，张春桥便迅速垮台，就是一个最有力的说明。

以三十年后的眼光审视《张春桥与上海一月革命》一书，我们当然无法认同该书的所有观点。但是上面提到的这些内容看来是经受了历史考验的。尤其是维尔德提出的研究径路和理论分析框架，值得我们在进行相关研究时借鉴。

(Andrew G. Walder: Chang Ch'un-ch'iao and Shanghai's January Revolution, 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1978)

□ 原载《书屋》2009年第02期

~~~~~  
【人物传奇】

杨宪益传（节选三）

• 雷 音 •

104. 满目疮痍外文局

坐了四年牢，杨宪益回到了原单位外文局。他惊讶地发现，在他坐牢的几年里，外文局的运动非但没有减弱，反而战火越烧越旺。“清理阶级队伍”的运动未完，紧接着又来了“清查5·16分子”的“批、查、打”运动。外文局大院仿佛变成了反复厮杀的战场。截止到杨宪益被释放的。1972年，大战的硝烟仍未散尽，留下一片死伤狼藉。在1968—1973年开展的“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两千多人的外文局，被揪斗和被关进“专政队”的居然高达220人（还不包括几十名被捕、被拘留及其他“现行反革命分子”），占全局总人数的10.74%！（均见《中国外文局大事记》，新星出版社）此外，这次运动中，除了这批公开被审查的二百多人之外，还有196人是“背靠背审查”的（均见《中国外文局大事记》，新星出版社）。两者相加，在“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被审查的人数就是四百多人！而在另一个所谓“批判极左思潮、清查5·16分子”的运动中，被“隔离审查”、“办学习班”及被点名批判的又有270余人（均见《中国外文局大事记》，新星出版社）。两次运动加起来，被审查被冲击及被专政的人数就将近外文局总人数的一半！一个单位有如此庞大的人数被“整肃”，即使与其他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相比，也算得上是“重灾区”了。

事隔数年，四人帮打倒，新时期到来。外文局领导小组对那场人人自危的“清队”运动做了结论。该结论说：

经过几年来的复查工作证明，外文局在清队中受审查的同志没有走资派、没有叛徒、没有特务、没有里通外国分子，没有一个阶级敌人。凡是在清队中被错误地揪斗、点名或关进专政机关、专政队的同志一律给予平反。对于在清队中死亡的同志要公开给予平反昭雪。（摘自《中

## 国外文局五十年大事记》)

至于所谓的“清查5·16运动”，外文局领导小组在1979年的《平反决定》中指出“外文局没有一个5·16分子，更不存在所谓5·16反革命集团，外文局的清查51·6，完全是一个假案。”虽然做出了彻底平反的决定，然而那些在运动中死于非命的人却永远回不来了。据统计，外文局在文革六年（1966—1971）中“自杀身亡”的人数是23人（据《中国外文局五十年大事记》）！其中死亡人数最多的是“清队”高潮的1969年。仅仅在那一年，就有8位知识分子寻了短见。其中就有杨宪益在回忆中特地提到的《中国建设》总编室主任方应旸和《中国建设》副总编陈麟瑞。这两位文人，一个是获美国哈佛大学英国文学硕士学位、学贯中西的老一辈知识分子；一个是年富力强、正日益成为《中国建设》的顶梁柱的业务尖子；这两个年龄相差二十岁的两代知识分子在同一年同一场运动中被逼而死，至今令人唏嘘不已。

方应旸（1925—1969），江苏灌云县人，中央大学外文系毕业。1952年，中、英文俱佳的方应旸从上海调来北京参与《中国建设》草创工作。近二十年来，他历任设计组组长、编辑组组长，最后成为《中国建设》总编室主任。方应旸是有名的干才。《中国建设》几十年的成就离不开他的杰出贡献。1968年11月初，他以莫须有的“历史问题”被“隔离审查”。在残酷恐怖的政治高压下，他在两个月的时间内被迫写了九十多份“检查交代”，仍然不能达到专案组的求。专案组逼他承认自己是“美帝特务”，威胁他：如不“老实交代”就“抓到公安局”去。在身心即将崩溃之际，方应旸提出与妻子见一面，也被专案组拒绝。1969年1月10日凌晨，陷于绝望之中的方应旸跳楼自杀。年仅43岁。他去世时，三个孩子中最大的才5岁，最小的才5个月！

就在方应旸去世当天，他的妻子来外文局上班时（方应旸的妻子王培珍也在《中国建设》杂志社工作），专案组派人把她拦在传达室，当场叫她拿出《毛主席语录》，命她念“什么人站在革命人民一边，他就是革命派，什么人站在反革命一边，他就是反革命派”这一条语录。紧接着，外文局军宣队和造反派当着方应旸的遗孀和闻讯赶来的弟弟的面开起了“批斗‘特务、历史反革命分子’方应旸”的大会（方应旸已死，只能缺席批斗），会上高喊“方应旸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罪该万死”的口号（王培珍访谈，2000年5月30日，北京）。当笔者于2000年采访王培珍女士时，她和患病的大儿子方霖挤住在狭小的两居室单元宿舍里。三十多年来，她一个人含辛茹苦带大了她和方应旸的三个儿子。如今，已到人生黄昏岁月的她只能活在对方应旸的无边无际的怀念中。

陈麟瑞（1905—1969），笔名石华父，浙江杭州人。1928年毕业于清华大学，1932年获美国哈佛大学英国文学硕士学位。1933年回国任上海暨南大学外文系主任。此后他的一生，都在编辑和教学生涯中渡过，是个典型的“书斋型”知识分子。陈麟瑞生前最后的职务是《中国建设》杂志社的副总编。他的朋友杨绛先生在一篇怀念他的文章中说他是一个“最随和、最宽容的一位朋友”。就是这么一个最老实的文化人，在文革中遭了厄运。他也在“清队”中被“揪出”，遭到“抄家”和“关牛棚”。但是，和别的被“冲击”的人相比，陈麟瑞的遭遇并不是最惨的，他没有被毒打，关了几天以后还被“释放”回家。所以他的自杀颇使人意外。岂不知，正是这个老实巴交的人，心中有最固执的念头。他坚守着“士可杀不可辱”的底线，在即将开他的批判大会的前一夜，喝滴滴畏农药自杀（柳无非访谈，2000年4月30日，北京）。他终于“劈开生死路，退出是非门”了（他的好友杨绛悼念他的词）。

当笔者于2000年4月去访问陈麟瑞年过九旬的遗孀柳无非（她是我国著名诗人柳亚子的女儿）女士时，才得知，陈麟瑞先生还是个卓有成就的剧作家。孤岛时期和沦陷期的上海剧坛曾成功地演出过他写的多部剧作。这样一个学贯中西，多才多艺的老实文化人，成了千万个文革牺牲者中的一个。

除了方应旸和陈麟瑞，外文局另外那二十一个无辜屈死者的姓名、生平和被迫而死的经过，因种种原因，笔者没有细考。希望有心人会做这件事。使他们的死（和所有无辜者的死）能成为历史的一面镜子，永远警示后人。

### 105. 孩子们回家

杨宪益在狱中每当回想往事时，就会想起他的三个孩子。他时时感到几十年来一心扑在他自己的事情上，忽视了三个可爱的孩子；出狱后，杨宪益陆续了解到他和戴乃迭的被捕给所有亲人带来的灾难：他七十多岁的老母亲被罚天天扫马路，他的三个孩子成了无家可归的“狗崽子”，发配到了天南海北；就连他的两个妹妹和妹夫也立即作为“特嫌”被“隔离审查”了八个月至两年。他感到自己连累了亲人们，特别是对不起自己的三个孩子，他决心弥补这一切，他要让他们回家。

杨宪益通过努力，陆续把两个女儿和儿子从河北沧州、东北吉林和湖北鄂城调了回来。但是，杨宪益在很久以后才意识到，把“人”调回来容易，可要把“心”重新拢在一起就不容易了。“文革”已经毁坏了他们的家庭，有些东西已经失去，永远都不会回来了。

当杨宪益和戴乃迭在1968年被“北京市军管会”当众“逮捕”时，杨宪益的三个孩子和他所有的亲人（恐怕除了他的母亲之外）都或多或少地相信了“政府”的话（在1968年，林彪还没有“出事”，党和领袖的威信还很高）：既然政府和公安部门敢于公开把杨宪益和戴乃迭抓了起来，肯定是掌握了他们确凿的“间谍活动”的证据。在“党、革命、人民”和自己“有罪”的父母之间，他们当然要站在“党和人民”一边，与自己的父母“划清界限”。但是，他们的这番痛苦的挣扎换来的却是更深的痛苦。因为他们发现，不管他们怎样表示要“忠于党忠于毛主席”，“跟着党干革命”，他们仍然脱不了“间谍子女”的恶名，他们身上的污点永远洗不掉，他们永远被人看不起，永远遭人歧视。杨宪益的小女儿、当时19岁的高中生杨炽在回忆中谈到，当时即使是插队落户也要按家庭出身分三六九等。她只能去“最差”的地方：

那时候家庭出身好的可以干这个干那个，可以去当兵，可以到内蒙兵团、到陕西去插队。陕西是极穷的地方，还得出身好才能够格。完了以后是山西，山西就差一点了。然后就是在北京招工的，一般是工人子弟。还有云南，到云南兵团也得过的去的家庭才能去。最后剩下的一帮是家庭出身极坏的，什么都不够格。加上学校里的一帮小偷流氓，还剩下二百多人。后来吉林来北京招人，学校动员大家报名，报了二百二十人，都是没有别的出路的。但是后来要迁户口，大家就都不去了。最后迁户口的就是二十二个人。我就是一个人。我们都是绝望了，在北京没饭吃，就插队走了。（杨炽访谈，1999年6月25日）

杨炽说，她当时的生存之道就是“在夹缝中求生”、“尽量别让人家注意到我”。她回忆了一件事，从中可以看出她是怎样在提心吊胆之中生活：

我是69年4月份下（农村）去的。头一年冬天就回北京（过年）了。东北冬天没有什么活儿干，一般知识青年都要回北京的。我们集体户22个人一同回北京。头一晚上我是住在一块儿插队的同学家里。第二天早上我就到了百万庄，我五姑（杨敏如）住在那儿。我没敢进她家门。我就到（她家）对面的一个楼。我心想，我要爬到楼梯上面去，楼梯上面有窗户，他们家住三楼。我想我可能看到他们家里边的情况：是不是人都在？是不是还住在那儿？是不是没事的样子？但是我们两人没联系。我看完了以后就到河北沧州找我姐姐去了。（杨炽访谈，1999年6月25日）

杨炽的这一番描述像是某个“反特”电影中的画面。她在北京已经举目无亲，惟一的亲戚家她又不敢去，怕被怀疑成“黑串联”。因为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时代，普通的亲人见面甚至写信都可能变成“阶级斗争新动向”而酿成大祸。杨敏如的回忆证明了这一点：

他们一被捕，我们两人立刻就都是“特嫌”了。他（罗沛霖）就回不来了。我很快地也隔离了。家都完了。我母亲立刻就扫街了。作为特嫌写交代。你知道我多难写吗？就是他们进监狱以前的十天，每天有什么来往都得写。一段一段地写。今天什么时候见到乃迭的？你们都说了什么话？你为什么送她一个被子？他们难道没有棉被吗？你送的棉被里有什么东西？把棉被都撕了，查里头有什么东西。那简直就像特务来了一样！…那时杨荧（杨宪益的大女儿）住在百万庄（外文局宿舍），不能到我家来。给我写了个条儿：“我们都很好。……外面有个小狗，我们现在玩那个小狗。”他们（审查人员）就觉得“外边有狗”！跟《红灯记》一样！这一下就要了我的命了！（杨敏如访谈，1994年6月25日）

今天没有经过文化大革命的年轻人，看到上面的叙述会以为是笑话。可这不是天方夜谭，而是实实在在的真事。

经过几年的“六亲不认”的日子之后，突然传来父母被“释放”回家的消息，杨宪益的女儿们反而有些将信将疑。这些年来（从1966年起），他们耳里听到的尽是父母（尤其是父亲）的“反党、叛国”的“罪行”，怎么一下子他们就“没事”了？

杨宪益的妹妹杨敏如在回忆中谈到当时杨宪益的三个孩子面对自己家庭的“大起大落”无所适从的迷茫心情：

当时总理向他们道歉，叫所有专家的孩子都从外地回来。可怜哪，所有的孩子都不到家里去，都到我这儿来：“五姑，我们怎么办？”我说“回家！已经没有问题了，你们还不回家？（领导上）叫你们回来的。”他们觉得他们是敌人嘛，要不要划清界限？（杨敏如访谈，1994年6月21日）

杨宪益的小女儿杨炽在谈到这个问题时说：

当然，我们开始回来觉着有点别扭。因为——虽然我也没有到哪儿去揭发过他们，或者跟他们表示什么划清界限，但是这么多年来就是这个事实。可是现在又好了，他们又没事了……反正有点别扭。（杨炽访谈，1999年6月25日）

孩子们回来以后，杨宪益和戴乃迭忙着操心他们的工作、学习和被耽误了的婚姻大事。杨宪益在回忆中说，从1972年出狱到整个70年代末，他和戴乃迭把主要精力都花在孩子们身上了。他们操办了两个女儿的婚事，又想尽办法让两个女儿去美国留学。杨宪益想用这一切来弥补文化大革命对他的孩子们青春的耽误。

但是，杨宪益很快就发现，有些事情是无法弥补的。他们的儿子杨烨，由于受到的创伤太深，神经系统出现了问题，且病况日益加重，难以复原。他们的家庭为此遭到了很大破坏。

## 106. 杨烨的遭遇和“发疯”

关于杨烨，笔者在《父与子》一节中已经写过。但是鉴于他对杨宪益和戴乃迭（尤其是戴乃迭）的后半生影响太大，他的遭遇又具有典型性，故再专门写一写他。



笔者采访杨宪益时，他曾简短地评价儿子说：“他是个极左派”。对比杨烨当年的所作所为，杨宪益这么称呼他似乎并不为过。但是，如果换一个角度来看，杨宪益对儿子的这个评价就失之于简单了。

杨烨之所以会“极左”，除了当时的社会大环境的制约和影响、除了他自己要挣脱家庭的阴影，争取个人的前途以外，还有一个重要因素：他真诚地相信了当时的宣传，相信最高领袖毛泽东说的每一句话。他自认为“建立共产主义的人生观、世界观”就是要与过去的一切“决裂”，与自己的家庭“决裂”，与一切旧的意识形态实行根本的“决裂”（这都是当时时髦的宣传）。他相信文化大革命是一场“彻底埋葬旧世界”的“史无前例”的伟大的革命和创举，他全身心地投入到这场革命中去。正因为此，他参加文革，不是被迫，不是半心半意或虚情假意，而是真心诚意的。据他的五姑杨敏如回忆，文革一开始，杨烨甚至自己出钱买了一个油印机，自费印刷宣传文革和红卫兵运动的材料。这个举动和他父亲杨宪益当年自费购买油印机宣传抗日几乎是一模一样，都是出自爱国青年的一腔热血。

但是，红卫兵的极盛期很短。很快，红卫兵就被“工人造反派”和“军宣队”取代，并立即从“革命动力”转变为“革命对象”了。1966年底至1967年年初，杨烨和其他“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一行数人受当时的国务院秘书长周荣鑫委托到南京调查两派（即所谓“好派”、“屁派”）群众组织，向“党中央”汇报。此举后来成为一项“挑动武斗”的“罪行”（杨苡访谈，1999年5月25日，南京）。随着周荣鑫被江青点名而倒台，杨烨也背上了“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反军乱军”、“5·16分子”等一大堆罪名。他在大学里成了“审查对象”，无数次被批斗审查，精神已经受到了刺激。1968年，在父母双双被捕后，杨烨又背着审查对象的恶名分配到湖北鄂城一家县农机厂。在那里，他受到变本加厉的迫害。他的档案里本来就有“5·16嫌疑”的尾巴，加上父母的“间谍罪行”，杨烨立刻也成了一个被怀疑的人。可笑又可怖的是，在鄂城这个闭塞落后的小县城里，杨烨的“外国人”的长相居然成了他的大累赘（在北京这个问题没有那么严重）。他走到哪儿都会被人认出来，走到哪儿都有人对他指指戳戳。他觉得，他的西方人的容貌出卖了他，使他再也逃脱不了“外国间谍”的阴影。政治高压加上文化封闭落后的双重压迫，残酷的现实和他的信仰形成巨大的反差，杨烨有些支持不住了。对他比较了解的五姑杨敏如在回忆中谈到了杨烨在鄂城的一些情况：

我不知道外头人心有多险恶！他（杨烨）的脸又像外国人一样。他到了鄂城就没有好日子了。他们（当地人）就说“噫，来了一个外国人！”……他爸爸妈妈一进监狱，那就是特务了。不是特务能进监狱吗？所以他就变成特务的孩子了。有人自己偷听敌台，就嫁祸于他，说“我没有听，是杨烨听的”。大家觉得说的很合理：杨烨像个外国人，他一定是偷听敌台的。……他受的审查很厉害。把他的钟表都拆了，把他的被子都拆了，防止有特务活动。他受了很多罪。没有人同情他，没有人跟他说话。（杨敏如访谈，1994年6月25日）

为了落实杨烨的“罪行”，鄂城县农机厂的专案人员甚至不远千里跑到北疆杨炽插队的嘎什根公社来“外调”。杨炽在回忆中谈起一件她至今感到遗憾和后悔的往事：

我哥哥可能最后有一件事比较怪我。……他刚到湖北的时候，他让我把他的书给他寄去一些。我就把能够找到的他的书都给寄去了。可能有一箱子书吧。结果里边有一本东西，是他上中学的时候搞国防体育活动练发报的小册子——那时候有一阵子全国都在搞国防体育活动，包括跳伞，骑摩托车和旗语，还用摩尔丝密码练发报。他那时候跳过伞，还练过很长时间发报，那个码记的很熟的。我们小孩在家里也练密码玩儿——结果在我给他寄的书里面有一个小册子是这个摩尔密码。书到了以后，人家就查他的东西。就认为这是特务活动。这（本书）就是一个根据。他有点怪我为什么给他寄这么一个东西？！（杨炽访谈，1999年6月25日）

一本中学生搞军体活动用的工具书竟成了特务活动的“罪证”！专案人员根据这件“物证”，大大加强了对杨烨的逼供和迫害。多年的审查批斗，严重损坏了杨烨的身心健康。他渐渐患上了某种“迫害综合症”。原本活泼开朗的杨烨完全变成了另外一个人，他变的郁郁寡合，时时处处都怀疑有人要害他。杨烨在回忆中提到，早在1971年，失散多年的三姐妹到老二杨荧插队的河北沧州见面时，杨烨走在街上神色总是不对头，他总觉得到处有人盯着他，到处都有人给他使坏。杨敏如在回忆中也举了几个典型例子：

我和他（杨烨）聊天，我说你觉得他们都怀疑你，他们怎么怀疑你，给我举个例子看。他说有一回我寄信，邮票贴倒了，我没注意。“贴倒是挺不对的。可是我改不过来了。”还有一次他去修电线，要爬高，旁边有标语。底下的师傅就说“杨烨，你把旁边的那个都撕掉，要不然你怎么做活儿？”他就撕了。撕完了他才发现，撕掉的正是“毛泽东”三个字！他觉得‘这个人是在陷害我’。（杨敏如访谈，1994年6月25日）

从杨烨举的这两个例子来看，他的担心决不是多余的。当时的中国，因为一张领袖头像的邮票贴反而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分子”或者因为无意中撕掉了毛泽东语录而被关进监狱的事例多的举不胜举（前面已谈及，六十年代初外文局一个干部不慎把印有列宁头像的邮票多切去了一点即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分子”）。这种社会环境正如法国思想家帕斯卡尔所说的：“人类必然会疯颠到这种地步，即不疯颠也只是另一种形式的疯颠。”在全社会都处在“另一种形式的疯颠”之中的时候，往往神经正常的人也会被逼疯（杨宪益及无数普通中国人在文革中的遭遇即是雄辩的例子）。因此，杨烨的所谓“多疑症”完全是周遭环境逼出来的，是一种“时代病”。正如福柯在《疯颠与文明》一书中所说：“疯颠不是一种自然现象，而是一种文明产物。没有把这种现象说成疯颠并加以迫害的各种文化的历史，就不会有疯颠的历史。”就中国的情况来说，在以“阶级斗争为纲”路线的统治下，动辄得咎的中国人，或多或少或轻或重都会出现类似的“神经病”。

可是，杨烨与众不同的是，他不像别人，凡事能够实行“中庸之道”，适可而止，且能跟随潮流而变化；杨烨在骨子里是一个不屈不挠奋不顾身的人，对他想不通的问题他要追到底。这一点和他的小妹妹杨焱区别就很大（杨焱曾对笔者说过，出于一种“自我保护”的机制，在家庭遭难时她往往会把最可怕的现实问题“排除”掉，不去细想。这种性格使她在灾难面前受到的伤害不像她哥哥那么大）。当初，杨烨公然和父亲划清界限，并“挺身而出”抄了自己的家，就出于这种“顶真”的性格；现在，他又顶真地追究起一系列问题来。他要弄明白，为什么他有了一个外国籍的母亲，考大学时就会受到不公正的待遇？为什么他生了一张外国人的脸，就会被怀疑是间谍？为什么他这么真心拥护热爱毛主席、共产党，反而处处受到猜忌和排挤？为什么他这个共青团员在工厂里不能发挥所长？为什么他的发明创造得不到赏识？（回北京后，杨烨写了一篇数学方面的论文，他的五姑父——国家级电子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罗沛霖对论文评价很高，认为其中有新发现，显露了杨烨的科研潜质和学术水准。但当时的政治气候不行，学术研究还完全提不到日程上来，身为电子工业部科技司副司长的五姑父也无能为力。可杨烨误会了五姑父的意思，以为是他“政治上不可靠”，才不用他的发明。这对杨烨又是一个打击。）

杨烨以与众不同的方式进行这种追究，他以某种“病态”的方式揭示现实的荒诞，与现实对抗。杨敏如举了几个例子：

有一天，杨烨忽然到我家里来了。我说你干嘛来了？有事吗？“没事，我家里头来了外国人。”我说那有什么关系？……他在电视里看见接见外宾，就说“把这个关掉”。他觉得不能跟外国人联系，可怜极了！他到我这儿看书，就只借鲁迅、马克思主义的书。要有别的，就说“五姑你怎么能看这种书？你怎么能看这种书？”……他不是一下子就疯了的，反正有点怪。这时候也有人给他介绍（对象），也有个姑娘很喜欢他，我们就跟他提，他说“五姑你了解她吗？你

了解她家里吗？了解她思想吗？不了解怎么谈？”还是这毛病。（杨敏如访谈，1994年6月25日）

杨烨在恋爱问题上的执拗不是他的异想天开，完全是现实在他头脑中的反应。当时中国人的恋爱和婚姻，完全受制于“阶级斗争”的条条框框。择偶的首要标准是“政治条件”如何。杨烨在这个问题上的乖癖表现，毋宁是一种“以毒攻毒”的方式，来对抗不合理的现实。

杨烨与现实对抗的最极端表现莫过于他突然宣布自己是英国人了。在连续失眠多天以后，某一天早上杨烨突然开始说英语，再也不说汉语了（他从小一直说汉语，父母从未教他说过英语）。这一举动使所有的亲人震惊。据杨敏如回忆，杨烨这一变化的“灵感”来自于美国专家韩丁的女儿卡玛。她在来看望杨烨（他们从小就认识）的时候的一番话打开了杨烨的思路。她说（大意）国籍是一个人身份的标记，没什么了不起的。如果她愿意，她可以入中国籍，也可以入美国籍。杨烨也有这个自由。因为他母亲是英国籍。这一番话对杨烨有醍醐灌顶的作用，使杨烨一下子顿悟到终于找到了他一切问题的关键：因为他有一半“外国人”的血液，所以他在这个既排外又高度政治化的国家永远不会被当作“自己人”；既然他的血统不能改变，他只能改变国籍，才能改变自己“永远是外人”的命运。经过连续多天彻夜不眠的思想斗争之后，不屈不挠的杨烨终于做出了成为“英国人”的决定。而且，倔强的杨烨“一不做，二不休”，他不仅从此只说英语，不说汉语，而且从此不吃中餐只吃西餐了。他这一惊人的举动对全家震动极大，加剧了家庭的矛盾：母亲和奶奶整天惊惶不安，魂不守舍；而父与子之间，逐渐形成了几乎不可弥合的分裂。

#### 107. 父与子（二）

杨宪益和杨烨这一对父子，表面上区别很大：杨宪益处处落拓不羁，满不在乎；杨烨却细腻含蓄，有点神经质。但在骨子里，父子二人却十分相像：在关键时刻表现出男子汉的硬气，决不服软，决不轻易放弃。杨烨在回忆中曾谈到童年的一件往事，可以作为上述看法的一个注解。当时她四、五岁，哥哥杨烨带着她和一帮孩子们爬到外文局楼顶上玩，惊动了大人们。他们找出这次行动的“罪魁祸首”杨烨，向杨宪益告了状。从来不打孩子的杨宪益居然动手打了小女儿几巴掌。小杨烨为了躲避惩罚，整整一夜没回家睡觉。他宁可露宿野外，也不向父亲的“强权”低头。那一年，杨烨十二岁。

这一次，倔强的杨烨做出石破天惊的决定，搅得全家不得安宁。他在家中不说汉语，断绝了和家人的交流，只有惶惶然的妈妈戴乃迭和儿子对话。杨宪益对杨烨的“怪癖行为”十分生气，他不能容忍儿子从“极左”跳到了“极右”，更不能容忍儿子要做英国人！他大发脾气，骂儿子是“混蛋”，父子关系日益紧张。杨敏如在回忆中分析了杨宪益当时的思想轨迹：

你看杨宪益这个人，他儿子一百八十度大转弯成了外国人的时候，他就比他极左的时候还恨他。他能容忍极左，因为他也有极左思想。他不能容忍一个人成了外国人了，最不能容忍了。你就知道他住在友谊宾馆（1994年6月杨宪益搬到友谊宾馆去住）多别扭了。他不要当外国人！（杨敏如访谈，1994年6月21日）

杨烨的回忆中也谈到了父亲和哥哥的矛盾：

（起先）我爸爸觉着他思想上（有问题），实际上他很快表现的不是思想问题而是精神上有毛病。但是我爸爸很长时间都不能够接受这个事实。他觉得——他按中国人传统的想法，觉得精神病是一种弱点，好像人格上的缺陷——你怎么能够这样？！所以家里边就不是很愉快。……我爸爸认为“我自己在文化大革命初期也有很大的精神压力，我也有过幻听幻觉现象，但是我

没有崩溃，你怎么会这样？！”（杨炽访谈，。1999年6月25日）

杨敏如、杨炽的分析和回忆揭示了父亲和儿子之间巨大的心理隔阂和误解。杨宪益不理解儿子的痛苦，也没有试图去接近和理解他的内心。两个性格刚毅的男人之间发生了激烈深刻的碰撞（这种碰撞不表现在外表，而是在内心深处）。福柯在《疯癫与文明》中有一个重要的观点：当世界处于极度荒谬之时，真理往往是通过“疯癫”的中介来揭示的。疯癫与艺术作品共同诞生，迫使世界对自己提出质疑。通过这种与艺术作品共始终的疯癫，世界在历史上第一次成为有罪者。

杨烨虽然不是艺术家，但他所有的疯癫行为都是针对世界的不合理而来。而且，惟其“疯癫”，才有惊世骇俗的力度。可惜的是，杨宪益没有这样想；作为父亲，他没有尽量与儿子的“非理性”行为进行沟通。他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与世俗的认识没有什么两样。当然，从世俗的角度来看，杨烨的这种“病态的反抗”已经远远超出了一般人能够理解和容忍的限度（直到现在，人们说起这事时，即使最善意的说法也只是以“他有病”来解释一切）。

父亲的反对和家人的不理解使杨烨更加孤独，他越来越躲避人群，最后，他干脆以自闭来对抗。他把自己关在房间里，不洗脸，不换衣服，不吃饭，不见人。他表现得越来越“疯”了。然而，杨烨并没有停止“成为英国人”的奋斗。在经过多方努力之后，他采取了最大胆、也是最危险的行动——闯英国驻华大使馆。他多次失败，但是他绝不气馁，而是再接再厉。有一次他拿着母亲的护照居然骗过了卫兵，成功地闯进了大使馆。当然，他最终被“送”了出来，并被公安局拘留。

杨烨的行为使杨宪益和戴乃迭焦头烂额，无计可施；连外文局领导也为此而大伤脑筋。最后，周恩来亲自过问此事。他做出了决定：同意杨烨到英国去。戴乃迭在征得姐姐希尔达同意后，请了假，匆匆忙忙地送杨烨去了伦敦。时间在1975年底。

杨敏如回忆了杨烨临走的一些细节：

最让我难过的是，他走了，把他的书都烧了，都不要了。他也懂得不会回来了。他就留着他的团员证、毛主席像，一点儿东西，他把它包起来。好像他觉得这一段生活已经过去了，我还很珍惜，还都保留着。所以这孩子可怜极了！什么错都没有！要是差一点的孩子，出来以后骂骂咧咧的“共产党真可恶”什么的，都不会得这种病！（1994年6月25日）

到最后，杨烨和父亲的关系近乎破裂。他不承认自己是杨宪益的儿子（他承认戴乃迭是他的母亲）。他认了一个英国干爹，此人是杨宪益和戴乃迭的友人菲力克斯·格林；杨烨给自己起了个英国名字：大卫·格林（David Greene），用的是干爹的姓。他到死都用着这个名字。至今，他的墓碑上刻的仍是：David Greene（1942—1979）。

这是一个悲惨的故事。它造成的伤痛毁坏了杨宪益和戴乃迭的后半生，并影响了杨家几代人的生活。

## 110. 噩耗

1979年1月上旬某一天，正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不久，英国驻华使馆给戴乃迭打来电话说“告诉你一个不幸的消息——”，话还没说完，戴乃迭立刻预感到是儿子出事了。她迫不急待地问“是不是关于我儿子的消息？”对方回答“是。”接着，使馆的人简要地告知戴乃迭，她的儿子杨烨在圣诞节期间在英国的寓所自杀了。死的方式十分惨烈：他锁上房门，然

后亲手点燃了汽油，自焚而亡。时间是1979年1月6日。

对于儿子的死，杨宪益在自传中只写了几句话：

我们儿子的死是我们最为惨痛的损失。尤其对于乃迭打击更大。自从那次事变后，她的健康迅速地恶化了。（杨宪益：《白虎星照命》，252页）

噩耗传来以后的第二天，杨宪益照样去上班，甚至连戴乃迭也去班上坐了半天。同事们小心翼翼，绝口不提这个话题。从此，在很长一段时间之内，这件事在杨家成了一个“禁忌”。1979年9月（离杨烨去世才半年多），杨宪益和戴乃迭去英国探亲访问，他们见了戴乃迭的姐姐希尔达（杨烨正是在她家自焚的），也绝口不提杨烨的事。然而，在这种异常的冷静和克制的背后，却是永远无法疗治的锥心的伤痛。事实证明，这伤痛对于戴乃迭来说是一种“无期徒刑”，只有生命的结束才能终止它的折磨。

2002年10月21日，在杨烨去世23年以后，笔者采访了来北京探亲的戴乃迭的姐姐希尔达（那时，戴乃迭也已去世三年了），希尔达谈到了她的外甥杨烨。她说：

他是个那么文雅的男孩，非常有礼貌。他显得头脑清晰，知道自己要干什么。非常聪明。但他不会表达感情，不能与人打交道。他也不想与人打交道。

初见面时，他显得那么年青，像一个十多岁的少年人。简直不敢相信他已经三十出头了。他很害羞，有些神经质，很少吃东西，人越来越瘦。我感到他是个十分敏感的男孩子。但他无疑是个有抱负的青年。他的房间里堆放着意大利文、西班牙文和德文书籍，他还复印了他喜爱的英文诗集。

很明显，他来到英国是想成为一个独立的人。他想使自己成为一个“新人”。他想忘掉过去发生在他身上的一切。他要开始一种全新的生活。……因此，他也不想接触他在英国的家人。开头，我们是在一起吃饭，但是他说他不想这样一起吃饭，也不愿意接受我给他的钱。他说他会自己照顾自己。他还说，他不想遇见任何认识他和知道他过去的人。他想开始新的生活。他对我说，他想进学校学习。我想，他认为有了在英国接受正规教育的学历，又通过正式考试，就可以拥有全新的生活了。（希尔达访谈，2002年10月21日）

杨烨为什么不愿意与人打交道？希尔达用她的理解解答了这个问题。她说：

他不能跟人好好相处。我曾建议他去打打篮球，参加一些与人交往的活动。他还真的去了一次。但是很不高兴地回来了。因为他们问他“你是哪里人？”而他不想告诉他们他是从哪儿来的。他不想谈起他的过去。

天真的杨烨没有想到，“过去”是不能一甩就掉的；而全新的生活更不容易马上就开始。事实上，过去的噩梦无时不在折磨着他。希尔达说，他到了英国以后，仍然十分害怕给“抓回”中国去；甚至一见到中国人，他就吓的发抖。有一次，白霞和她的朋友邀杨烨外出游玩，他很开心，过了一个少有的愉快的假日。后来，他们去到一家咖啡店，店里有一对中国夫妇在喝咖啡，杨烨一见到这两个中国人，立刻脸色大变，愉快的心情荡然无存。糟糕的是，杨烨既想与过去一刀两断，他的护照却仍是中国护照，护照上的名字仍是他想忘掉的“杨烨”二字。每年一次的换护照，总要又一次提醒他想起过去的一切。他身在英国，用的是英国名字，身份却仍然是中国人（英国政府规定必须住满5年后方可申请加入英国国籍）。但是，杨烨既不愿意承认自己是中国人，又不是英国人。他夹在两种政治制度、两种文化和截然不同的两个国家

中间；他是一个无家可归的人。

临死前的几个月，杨烨显得格外的正常。每次希尔达为他清理好房间后，他往往会留一个小纸条儿，纸条上写着：希尔达，谢谢你！这使希尔达感到很安慰。那时已是1978年，毛泽东逝世已经两年，四人帮也早已打倒。杨烨并没有忘记故国，他的目光一直注视着这一切。希尔达回忆到一个惊人的细节，从这个细节可以看出他当时的思想状况：

在他的房间，有一张毛主席像。那是一张小小的像片，上面戳满了洞。看到这张像我吃了一惊！因为这反映了他真实的思想状况。他曾经是毛的那么忠实的战士——你们叫什么来着？哦，叫“红卫兵”。可是，毛却把这些年青的红卫兵打翻在地！

这张毛主席像正是杨烨从北京带到伦敦的，他一直珍藏着。走到哪儿都摆在他的桌上。如今，上面却戳满了洞。这张戳满了洞的毛泽东的肖像象征着他破碎了的理想。这个异乎寻常的举动揭示了杨烨内心翻腾的风暴。

杨烨死的很冷静。计划很周密。他事先准备了汽油。趁着姨妈希尔达将要外出之前行动。这样，家中有人，不至于把整栋房屋都烧毁。整个过程只有二十分钟，消防队就到了。而他也达到了自己的目的。他死的那么刚烈，正如他的为人。

杨烨是死在新旧交替，方死方生之坎上；他的死似乎成了一个象征。许多年来，人们避免谈论他的死，这是中国人一向的忌讳。久而久之，杨烨的名字似乎在人们的记忆中淡化了。只有一个人无时无刻地想念他；而且，时间越久，对他的思念越强烈越沉重——这个人就是杨烨的母亲戴乃迭。戴乃迭跟儿子之间似乎有一种特殊的联系；在三个孩子中，她最珍爱、期望最高的就是长子杨烨；杨烨的死是戴乃迭心中永远的痛。从此，她的生活永远没有了阳光。

杨烨是值得纪念的。他用他的死，发出了对政治迫害和种族歧视双重压迫的永久的无言的抗议。

~~~~~

【当事者说】

整脚的工程师和眼花的老祖母

• 叶志江 •

我是昨天才去唱诗班从李自茂手里拿到《倒下的英才》这本书的。在这之前，我写过一篇短文：《倒下的英才和救美风牛马不相及》。虽说在题目里提到了“倒下的英才”，但和唐学长这本书的内容并不相干，仅仅涉及到陆小宝所写的该书序言。事后，因为听说陆兄有“致歉并道谢”之意，我给传话的校友回了一封短信：

“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陆兄何言道歉。我只是就文中涉及我的部分作一解释，以免读陆文的人不求甚解，以为敝人真的有了什么倾向性意见。

我写的东西，往往有信笔调侃之举，只是让读的人一笑而已，也都是认不得真的。我答复别人的批评，大体上也并不计较胜负，只是又得了敲键盘（古曰“耍笔杆子”）的机会，开心得很呢。

陆兄常为他人作嫁衣，辛苦得很，难免遇到体型奇特的人，难为他了，哈。

昨晚我将唐学长的书大致翻了一下，竟又发现了让我大敲键盘的机会，真正是开心得很。该书第。109页至115页，在“关于老四打人”的标题下讨论了《救美》和《徘徊在生死之间》两文涉及的科学馆里俘虏的待遇问题。看来，讲倒下的英才和救美风牛马不相及，只是我的一相情愿，唐学长偏要相及一下。

我这个人虽说喜欢“讲故事”，但目光短浅得很，大体上只能说一些发生在身边的事，目光所及以外，都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不像唐学长那样，不仅有魄力，还有“远见”，能将“百日武斗”的历史场面全景式地收入书中。

所以，我只能和唐学长探讨一下这发生在我鼻子底下的“关于老四打人”的事情。在五百多页的书中，这一小节只占了五、六页，细微末节而已，唐学长可以忽略不计，也可以用她特有的工程师方式将我的文字筛选掉。

唐学长在书中引用了我在《徘徊在生死之间》中的一句话：“但同清华百日大武斗时我在科学馆黑牢中所遭受的七次毒打相比，算是小巫。”

唐学长评论道：“这是叶志江的一面之词。”

为了证明这“七次毒打”是一面之词，她又引用了两个权威人士的谈话或文字。

414 总部委员蒋南峰的采访谈话：

叶志江被抓时，我已不在科学馆，叶志江在网上写到他在科学馆内挨打，这些具体情况我不清楚。

包括我自己，本来许多人就是因为看不惯团派对无辜群众使用法西斯恐怖手段才参加414的。414的群众决不会容忍自己的组织也使用这种残暴手段。

曾在科学馆里担任过审判长的曹贤文说：

《救美》一文中叶志江说曾在科学馆惨遭毒打，为此有人向我求证。我负责任地说，至少在我在场的情况下，叶志江并没有挨打。但在我被“免职”后，就凭他的态度和老四们的火气，难免要受些皮肉之苦。而“毒”字是否用得有些夸张（不知详情，不敢乱说）。

我不知道唐学长使用的是什么样的工程师逻辑，而这两位权威人士的回答又是如何证明我的叙述仅是一面之词。

难道只要毛泽东说一声“刘少奇死时，我不在开封”，或者“我负责任地说，至少在我在场的情况下，贺龙并没有挨打”，刘少奇和贺龙的冤案便可以一笔勾销了吗？

其实，我虽然提到在科学馆里挨打一事，但我绝无任何怨恨之心。我真正感到有趣的是，因为挨打我知道了胸部和头部被打时人体的感觉。在我看来，这是难得的经验，就像我后来体会过化疗时人体的反应和取得了化疗可以治愈脚气病的经验一样。

所以，我津津有味地叙述，胸口遭到猛烈打击后只觉得所有的气管支气管，甚至于毛细气管都被棉花堵塞了，一点气也喘不过来，以及棍子猛敲头顶后眼睛前会一片金光灿烂，有如无

数颗金星在闪烁，壮观而又美丽。

有好几个人告诉我们他们有类似的经验，这让我很愉快。

我在我的文章里并没有详细叙述这七次毒打的情况，唐学长因而对此存疑是可以理解的。为了便于唐学长进一步了解我的“一面之词”，我似乎有必要略为详细地说一下这“七次毒打”的情况。在唐学长的书再版时，我们或许可以因此而见到她的“两面之词”。

在叙述之前，我必须重复一下陆兄对唐学长的赞美，也要按照“工程师的办事特点”来处理被打的情节，做到“有所不言，言必有实”。

从工程师的角度来看，我在科学馆里所遇到的确是仁义之师，我看出这一点是因为我从未无缘无故地被打过，每次被打都是师出有名，遵循经典物理中的因果关系。这是应当特别加以说明的，毕竟大家都是从“工程师的摇篮”里摇出来的，能明白政治家的角度和工程师的角度之间的差别。

我之所以能记得“七次毒打”便是因为这种因果关系，我记住的是每次被打的原因，这应当归功于在“工程师的摇篮”受到的训练。

这七次毒打的情况如下：

第一次，我刚跨进科学馆大门时，不懂规矩，自以为作为和平居民应可享受探监人的权益，态度明显不够端正，负有守卫科学馆重任的战士们当然要请我接受一次“下马威”的教育，而且这教育轻了不行，必须有足够的威力，好让我记忆深刻，从此遵守狱规。

第二次，我明明从陈育延那里得知孙华栋被打死的情况，并因此决定和陈当逃兵，试图离开学校，但在审判长的严词追问下，我居然为了个人名节隐瞒不报。所以，审讯时用棍子敲打我的头部是很有道理的，因为那秘密确实就在脑壳里藏着。“打破沙锅问到底”这句话如果换成“打破脑壳问到底”便可以解释为什么老四那天未能获得口供：我头上虽然鼓起了几十个包，但并无裂缝。

第三次，我逃跑被抓回，除了用铁丝捆绑我以外，再施以拳脚，那肯定是为了让我不再犯类似的错误，属惩前毖后之举。我后来果然安分守己，再也没有产生过逃出科学馆的念头，只是跟着邹韬奋周游列国，思想上开了点小差而已。

第四次，陈家宝逃跑成功，让弃暗投明的宣传攻势成为笑柄，我确实策划协助在先，揶揄嘲笑在后，居然讥讽看守人员为防止类似事件再度发生而采取的必要措施是“如临大敌”。我如此猖狂，被毒打一顿显然是罪有应得，怨不得别人。老实说，那次虽然被打，我还是开心了好几天，不仅是因为我帮陈家宝逃跑成功，更是因为陈育延会从陈家宝口中得知我在科学馆里的情况。

第五次，老团用燃烧弹（瓶）烧毁科学馆屋顶，老四群情激愤，一时又找不到肇事者，我既然加入团派，当然和上万名老团一样负有连带责任，所以，我被痛打时一点都不恨打我的人，而是在心里痛骂放火的人，这里的是非我还是分得清的。那一次俘虏们都被蒙住双眼，反绑着跪在顶楼地上，谁也没逃脱挨打，我不过是其中的主要打击目标而已。

第六次，某日凌晨，朱玉生被老团的枪弹打死在科学馆门外。因为只有一墙之隔，我是亲

耳听到那枪声的。从一片嘈杂的脚步声和“血债要用血来还”的呼叫声里，我非常担心自己会作为祭品奉献给倒下的英才。那一次毒打虽然气氛恐怖，但我只是破了一点皮，出了一点血，让我至今都为这微薄的奉献惭愧不已。

第七次，每次被打，我都是被蒙住双眼，只能靠耳朵判断出有多少条手和腿在我身上“操练”，唯一的例外是这第七次。我照样被蒙住双眼，但提审我的只有一个人。有趣的是，审讯者对我作了一次智力测验，问我知道他是谁吗。因为审讯者和我同系，我依据口音准确无误地报出了他的名字。但这并没有让我沾到免受刑罚的光。他的刑罚颇为特别，不是普通的拳打脚踢，而是用一段粗铁棒猛敲我的右肩关节，并不准呼叫。比较而言，应当承认这是一次时效最长的刑罚，我后来右肩时常疼得无法动弹，一直治不好。二十年后，我在美国做了手术治疗才基本解除了后遗症。

除了上述这些被打的具体原因外，每次挨打，常有人一边打一边提醒我：“打死你这个‘保蒋反康’的小丑”。这让我深刻认识到自己确实应当被乱棍打死，但有时却会迷惑起来，我想，“仁义之师”一贯高举反对中央文革和保护干部的大旗，应当对我的“保蒋反康”劣迹不至于会恨之入骨。所以，“打死”、“保蒋反康小丑”云云应当都是说着玩的，也就是嘴上说说而已，手下还是留情的，我能活着出来便是最好的证明。当然，这和我被打时善于“审时度势”装死躺下也有点关系。

为了证明我所言非实，唐学长特意在书中穿插了她在调查过程中得知的一个关于我拒吃馊饭的小故事。唐学长说：“叶志江说在科学馆里给他吃馊饭。那个把没有吃的馊饭端走的女同学对我说：‘……在我端走叶志江不吃的馊饭的路上，我实在是太饿了，这样的饭我们是吃不到的，我知道那饭是馊的，但是忍不住，还是偷偷地吃了一口。’不知道叶志江看到这里有何感想。”

在饿得七荤八素的时候，我居然会拒绝吃连老四都吃不到的米饭，这不是我饿昏后产生的误动作，便是那个饿昏了的女同学产生的幻觉。

我从未在任何地方说过我拒吃馊饭的事，但我确实说过一件拒吃“嗟来之食”的事：

一天晚上，看守突然端来两碗面片汤，让我和姓蔡的工人喝掉。一股久违的香味扑鼻而来，碗里还似乎漂着几片诱人的肥肉。当时我们六个俘虏合住在一间十分狭小的牢房中，我可以感到每个人都被这两碗面汤刺激得直咽口水。我迟疑了一下，问看守：

“那其他四个人呢？”

“只有两碗，快喝。”看守说。

“那我们分着喝。”我马上说，不料看守厉声回答：

“蔡是工人，你出身是工人，可以喝。他们四个成份不好，没有资格喝。”

那真是一个大讲“阶级斗争”的年代，即使当了俘虏，也得按阶级成份加以区别！

尽管那两碗面汤如此诱人，但人与人之间的情义更珍贵。我对看守说：“你拿回去吧，我们都不喝！”

这里讲的是“面汤”而不是“馊饭”。那面汤是看守当着我们的面从一个大桶里盛到碗里的。桶里的面汤已几乎见底，显然是老四吃剩下的，只剩了两碗，绝非如唐学长所言，我在科学馆里享受着特等待遇。事实上，比馊饭还要腐烂的食物当时都让我们垂涎三尺：

六、七月份，已是盛夏，天气炎热。我们吃的馒头也就由热变冷、变硬、变馊，最后变成了“藕”，掰开后，真的是“藕”断丝连了。

但就是这种“藕”一样的馒头，也成了我们最美味的食品，需要用二十个小时去盼望它。

我在《“救美”一文的前前后后》中倒是提到过一个和“馊饭”一事相近的故事，那是邱心伟讲的关于老四伤病员的病号饭的一段经历：

邱心伟在科学馆里负责病号饭（京剧“沙家浜”里沙奶奶的角色）。有一次，她给伤病员煮的绿豆粥馊了，她舍不得倒掉，却又不能给伤病员吃。多日没沾米，馋得忍不住的她悄悄地在倒掉前喝了几大口……。四十年了，她还记着她“偷吃馊味绿豆粥的事，一直没告诉过别人。怕别人怀疑我吃的是好粥，怕别人讥笑我馋成这样子。”

这里讲的不是“馊饭”而是“馊味绿豆粥”，女学生吃不到这样的“馊味绿豆粥”，是因为那是特供伤病员的。

想要知道我读了唐学长编写的故事后的感想吗？

作为工程师的唐学长，她的能力显然是蹩脚的，因为她既不尊重事实，信口开河，也缺乏严谨的逻辑能力。

作为老祖母的唐学长，她的眼睛已明显高度老花，建议她尽快去配一副新的老花镜，这样起码不会误读别人的文章。

~~~~~

## 【往事如烟】

### 大学回忆录——我被揪出来了

• 金 渝 •

对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党已经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从苏区肃反到延安整风、反右运动、反右倾、社教四清，如何“残酷打击、无情斗争”已经形成一套运作程序，充分显示了斗争艺术；那就是先开动员大会造成声势，并立即成立领导小组，再发现积极分子；然后再在群众中发起背靠背的揭发和面对面的批判，揭开斗争的盖子，最后再给被斗争的人员定性或落实政策，以及吸收骨干积极分子入党。运动就算结束。

省委工作队进校后，驾轻就熟地按程序操作。他们向各个系派出小组，甚至每个班都有工作队员专人负责联络。工作组和系总支（思想右倾的总支成员被排除在外）密切配合，在每个班成立领导小组，领导小组积极发展骨干分子，他们经常很神秘地开会，掌握动态，分析形势，确定斗争目标。于是校园里学生的自发行动少得多了，乱哄哄的局面得到控制。校园里的喧嚣开始降温，但是恐怖气氛却有增无减。因为形势发生了微妙的变化：横扫牛鬼蛇神扩大到学生了。揪学生中的右派和反革命，令大多数学生慌了手脚，人人自危，顾不上去批斗教师中的牛鬼蛇神了。

最早的右派学生是音乐系揪出来的，大字报贴在清真灶食堂的墙上。不到半天时间，呼啦啦整个墙壁被大字报糊满了。这是全校十个系五十几个班争相在这里揪出本班的右派学生和反动学生。大字报的标题大都是“某某某疯狂反对”“某某某恶毒攻击”“某某某极端仇视”等等。有些被揪出者事先毫不知情，大字报突如其来，令他措手不及。有些人大概有预感，也只能俯首就擒。凡名字上了大字报的，立刻自觉地遵从“只许规规矩矩，不许乱说乱动”，听凭革命群

众发落。自从一九五七年反右以后，不用谁教，每个人就知道，自己一旦成了敌我矛盾，就必须乖乖地就范，别无选择。这已经是中国人的本能了，也是潜规则。

看到学生给学生贴大字报的场景，我不由得打起了冷颤。我会不会被抓成右派？不会吧？运动开始以来，我一直是“割麦便割麦，舂米便舂米，撑船便撑船”，跟在积极分子后面屁颠屁颠的跑，没有出过差错么。我幻想着，侥幸着，可我还是没来由的打哆嗦。

很快，我班就有学生被揪了出来，不过大字报没有贴在校园食堂那里去，而是贴在教室里。大字报的语言也不是很严厉。于是我更加使劲宽慰自己无须杞人忧天。相信我们班的党团员不会对自己的同窗痛下杀手。然而我越是宽慰自己，自己却越是恐慌。班上的第二个第三个右派学生相继被揪出来了，大字报写的都是鸡毛蒜皮的事情，不过都上纲成“白专道路”“迷信封资修”的性质；再有就是什么生活作风问题。看着这些大字报，我只是担心自己，要是被揪出来，那可怎么办？那是多么的羞辱、在人前难以抬头啊！我确信今后的命运便是五七年被打成右派的人的那样，也许分配不到工作，那一辈子不就完蛋了？有时甚至会想：还能找到老婆么？又大骂自己：妈妈的，死到临头，竟会想这些问题！伴随胡思乱想，我恐惧，我慌乱，我不知所措。

我终于感觉到了大事不妙，大难即将临头。先是班上身居领导小组成员的同学突然和我拉开关系，并经常用异样的眼神打量我。我吓坏了，晚上开始失眠。随即我感觉到同学们开始疏远我，迎面碰见，竟绕着我走。随后一些同学即积极分子对我极其冷淡，有时还会直截了当地问我一些问题，如“你对文化大革命有什么看法？”由于这些人是我平时就很惧怕的人物，所以这时我同他们说话就特别拘谨。我嗫嗫嚅嚅的回答说：“拥护。”但他们不肯罢休，继续问我一些政治敏感问题。后来他们从我的答话中分析出我的许多罪行——所谓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接着，我被取消了开会的资格，小组会和全班会都不通知我参加。虽然我混迹在同学们中，去教室或是去食堂，但我形只影单，孤苦伶仃。我如热锅上的蚂蚁，恐惧、羞愧、焦虑交织，神思恍惚，吃不下饭，夜里不断地做恶梦，惊醒以后往往是一身冷汗。尽管如此，我还是心存侥幸。心想：不至于吧？老天爷会保佑我吧？

好朋友张士钢也惶惶不可终日。但是我们知道，不管谁先被揪出来，党团组织肯定要求另一人必须进行彻底的揭发，以示划清界限；那是不能拒绝的。我们都这样想，但是相遇却不敢讲话。于是有一天瞅人不注意，我们一前一后钻进厕所，蹲在便池上互相交换字条，我写了他可以揭发我的问题和万万不能交待的事情，他把他准备揭发我的问题以及他的哪些问题我可以揭发也开列出来。这就是所谓的攻守同盟吧！可怜我们就是如此这般的蹲在厕所里商量怎样蒙混过关！

恐惧和侥幸心理纠缠得我几乎神经失常。但在白天，我仍然按时去教室。自从工作组来了以后，教室的桌凳就集中在教室中央成了一张大桌子，以方便开会。我坐在自己的位子上拿出毛选摊开看。能看进去什么呢？只是做样子而已。反正谁也不理我，我也不理谁，装作学毛选彼此都不尴尬。

终于有一天午后，我到教室，枯坐在教室里照例捧着毛著装样子，忽然有两三个同学拿着白纸笔墨进来了，他们没有朝我看一眼，仿佛我根本不存在。我立刻直觉到他们要揪我了。

其中有一位同学，毛笔字写得非常好，我常拿他取笑，因为他平常不苟言笑，一身蓝色中山装，一顶干部帽，永远穿戴整齐。他的清洁，是良好的生活习惯，生活马虎邋遢的我本应该学习他，然而我却给他起了一个贬义的绰号“科长”，这绰号叫开了，从此跟定了他，在大多数场合取代了他的本名。多年以后同学们提起他，仍称他是科长。

科长的毛笔字在全班是数一数二的。此时他在我斜对面的桌子上摊开一整张纸，然后用笔调墨，弄毕，他将饱蘸着墨汁的毛笔用嘴咬住，双手展平白纸，歪着头思忖片刻，取下笔，开始笔走龙蛇，奋笔疾书。我紧张得心别别别直跳，似乎盼望他写我或者不要写我。我用眼角的余光斜瞥过去，果然三个大字正是我的名字。我不敢再看，一动不动，僵在座位上。一两个小时过去了，教室里已经没有人了，我感觉肚子咕咕地叫，意识到晚饭时间到了，便木僵僵地离开教室，拿了碗筷去食堂。

去食堂的路两边是生物园的篱笆和饭厅的墙，如今是大字报区，到处贴满大字报，是全校各系各班揪出来的学生的大字报。我佯装看别人的大字报以强作镇定。我一张一张看过去，我看到同班某人被人贴的大字报，揭发他说过“如果三十岁以前不能写诗成名，就要跳黄河”，这是他野心勃勃，极端个人主义等等。我很快看到科长他们给我写的大字报贴在篱笆上，整整七大张，标题是《坚决把毒蛇反革命分子×××揪出来示众》，内容列了我的若干大罪状，其中一条是针对我父亲曾经到学校来看我事，他们的结论是在文化大革命即将开始之际，老反革命来学校和小反革命策划破坏运动的密谋，勒令我老实坦白交代。诸如此类。我的心突突的跳，然而脑子里又是一片空白。我低着头走开，觉得满身都是刺人的目光。人们都在看我，真是千夫所指，要无疾而死了。其实来来往往的人互不相识，谁专门看我呢？这大概就是舆论对人的压力。

中国人最注重形式，形式不同，就有显而易见的不同等级。当时揪学生，就是有等级区别的。问题一般的右派学生，大字报贴在教室内；这表明尚没有把他们彻底地划在敌我矛盾之内。比较严重的，贴在教学楼的走廊内；问题特别严重的，贴在校园大字报区。班上已经有五六名同学被贴了大字报，贴到校园里的有两个，我是其中之一。显然，我是问题很严重的人。

全班同学像躲瘟疫一样躲我，没有人和我说话。但是次日上午，两名同学走到我面前，要求我交出日记。我老老实实回答，日记在宿舍里。他们如果同意第二天交，我就能撕毁掉。但是他们马上要跟我去取。说着便押着我回宿舍。一路上我心慌意乱，簌簌发抖。我知道日记上面有多处是我的阴暗思想，悲观厌世的心情，有很消极很灰色的内心独白，还有对某些同学讽刺挖苦的文字。一旦公布于众，只消略加上纲上线的分析，就是严重的政治问题，那我就身败名裂，死无葬身之地了。我一路上紧张地考虑怎样乘机撕掉关键的几页，或者撒谎找不到、丢失了等等。进了宿舍，我磨蹭着。日记锁在箱子里，我已经好长时间再没有写过了。押解的同学似乎看出了我的企图，催我快交，我非常驯服地取出，奉上，没有任何的其他举动。害怕啊！那时我压根儿没有想以他们侵犯私人人身权利和个人隐私的正当理由拒绝，没有。对革命而言，老百姓没有隐私；而领导人的一切，才是绝对的机密。顺从革命，我们已经习惯成自然。我到现在还不完全明白为什么阶级斗争整人，被整者从来都是俯首就范，引颈受戮？就像响尾蛇或者眼镜蛇，只要目光锁定一只青蛙或一只田鼠，这青蛙或田鼠就会觊觎着自己向蛇口里一步一步走去一样。看看三十年代苏区的肃反，看看数以千万计的农民活活饿死也无人挺身而出铤而走险，看看高岗、刘少奇，不管他昨日如何炙手可热、威猛无比，今天他被党宣布为敌人，连辩诬他都不敢。第一反应就是下跪谢恩：“臣罪当诛兮，圣恩浩荡！”何况我辈草芥蚁民？毛的体制竟有如此大的威力，真令人悲叹不已！或许毛思想体制在中国找到了它最适宜的人文环境，这是很值得研究的。

想必他们已经给我成立了专案组。他们审查我的日记，如获至宝，因为找到了他们所需要的东西。我受到了监视。有一天我去十里店理发，回来的路上竟发现两个同学跟踪我。我走他们走，我停他们停。我忽然冒火了，抑制不住想开个玩笑。我突然快步向前，甩掉他们。我跑步进了文科楼，闪身钻进厕所，进大便格子间蹲下一动不动，一声不响。我听见外面一阵杂乱的脚步声。脚步声从东到西，从西到东。我仿佛看见他们慌做一团。有人紧张地喊：“快到黄河

边去找！”哇，他们是担心我跳河自杀呀！我心里冷笑。

当时一个班的同学，已经分成三六九等。第一等是进入领导小组的，是出身好又是党团员干部，这是核心，决定全班同学的政治生命，要揪谁或者先揪谁由他们提出。第二等是运动骨干，积极分子，他们出身红五类或者出身不好却已经和家庭划清了界限的团员；他们执行小组的指令，写大字报，搜集问题，开会带头发言造声势等等。第三等是出身好，却太胆小老实又善良，不愿意整人、又不敢不听命令，小组命令他们跑龙套；跟踪人，贴大字报就派他们担当。第四等就是革命群众，大半是出身不好、在运动中只能起摇旗呐喊作用，或者虽然积极表现、但组织上并不信任的人。他们人数最多，要揪出来的人就在他们中间。最后一等就是揪出来的右派学生、反动学生、反革命学生。

我并非没有想过自杀。我想过，如果一旦揪出，干脆一死了之，然而怎样的死法没有痛苦呢？我想来想去，也没有想出不疼痛、不害怕的死法。多年以后，几位老同学聚会，说起往事，有人提到某次在楼顶露台上开会学习，我站在楼顶边沿俯身往下看了很久，大家以为我要跳楼，非常紧张。我想起来确实有此事。当时我向楼下面看，并没有跳楼的计划，不过我在心里想象，如果纵身跳下去，那脑袋撞在水泥地上的刹那间，一定疼痛难当吧？我怕疼。那些天我夜里躺在床上睡不着，有时也想上吊吧？但那咽气之前的窒息，一定非常难受。我怕那种难受。跳黄河吧，水呛进肺里的感觉，一定很可怕。于是我哀叹：我不怕死，可就是怕那死亡瞬间的痛苦，于是准备死的念头不了了之。由此我有一个结论：说那些自杀的人是胆小鬼的话，是完全错误，他们是真正的勇敢者。

奇怪得很。在没被揪出来以前，我如坐针毡，度日如年，神思恍惚，寝食不安，夜不成眠。这一下终于被揪出来了，反而倒像万事大吉，心里坦然了，一桩心事终于了却。反正已经当定了右派，就有了破罐子破摔那样的心态，死猪不怕开水烫，将来就是劳改，随它去了。抱定此种态度，我随遇而安。吃饭睡觉居然踏实了，能吃能睡。真如俄国十九世纪革命者所言，等待死刑宣判比死刑本身更可怕。真是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斯言不谬也！

那时我不晓得，班上揪出了越来越多的“右派学生”。揪出如此众多的学生，必然引起尚没有被揪出的学生们的恐慌。有同学深恐自己被揪，遂大大提高揭发我的火力，坚持主张对我进行批斗，因为这样可以证明他的革命性。在揪出第五名右派学生的大字报上，其名字后面有六个点的省略号。运动积极分子动员同该右派学生过从甚密的人揭发问题，说若不积极揭发，你就是那省略号里的点儿。有同学在小组学习会上发言时痛哭流涕的检查自己的问题，说：我就是“点点”里的人，要赶紧悬崖勒马，痛改前非，一定要主动交代错误言行，努力用毛思想改造自己，做合格的接班人云云。一时间，人心惶惶，都怕自己在“点点”里，倒是我们被揪出来者，高枕无忧了几天。

揪学生搞得校园里一片恐怖。班上第二批“右派学生”“反动学生”随之被揪了出来。中间只隔了一周时间。两批人合起来约有十名学生，但这还不是全部。在运动核心领导小组内已经敲定了第三批有问题学生的名单，里面还有“大鱼”。积极分子也得到了相应的指示，只等一声令下，就开刀问斩。这时我已经是死猪不怕开水烫了。开会学习坐在后面，没有人要求我们这样做，然而假设我坐在头排，相信一定会引起轩然大波。这种自知之明，亦来自潜意识里经过数千年沉淀的等级遗传基因的指使。卑怯之弱者或者失败者无须教导就明白怎样请安，怎样磕头，怎样引颈就戮。

我也晓得自己没有发言权，所以开会默不作声。我知道运动结束时，我的命运才有分晓。于是我就有充足的时间观察了。

有一名我对他说话不设防的同学，还是干部，后来揭发了我的不少问题。我完全没有想到他是整我的急先锋，更没有想到他整我的目的是邀功取宠、保护自己。我就这么笨，他把我卖了，我还帮他点卖身钱呢！原来他怕自己被揪出来，故而拼命地揭发我以立功赎罪。他坚决主张我为反革命分子，极右学生。这在当时，等于是死罪。这位同学是有点拿别人的血染红自己的顶子的味道。

好友张士钢面临被揪的境地，正是度日如年的难熬时刻。他很走运，正要给他贴大字报时，突然接到了不整学生的中央指示。

我可以问心无愧地说，我无害人之心。也许有人认为我由于被揪了出来，以至于没有得到害别人的机会。这当然也是一说。然而已被揪出来的人是必须要揭发他人问题的，这是他义不容辞责无旁贷的。当积极分子要求我揭发他人时，我尽说一些鸡毛蒜皮，无关痛痒的问题，无非再扣上一些大帽子。由于不肯揭发有分量的问题，我又蒙上了“顽固不化”的新罪名。

事实胜于雄辩，本是颠扑不破的真理。然而在那个时代，却是雄辩胜于事实。也就是古人所说的：“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如果因为你是一个有独立思想的人，有个性的人，不合群的人，性格孤僻的人，爱发牢骚耍贫嘴的人，说了令上司感到不高兴的话的人，那么，积极分子可以把属于你的事实掐头去尾，断章取义，改造成另一种事实，或者对你的话吹毛求疵，捕风捉影，加以绵密的论证，最后雄辩地证明你是罪大恶极的人民公敌。他们也口口声声不离“事实胜于雄辩”，然而他们此时所说的事实，是经过他们雄辩后的事实，而他们嘴里的雄辩，是你为自己所做的辩解。你越辩解，问题就会越多。雄辩胜于事实或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乃是我们的传统文化思想中最能支配我们行为的专制等级思想与以无真实信仰、不按规则出牌的流氓意识混杂的绝妙体现。雄辩者的背后是有刀和圣旨做靠山的。所以被他们横加罪名的人无不诚惶诚恐地引颈就戮。雄辩者绝无胜之不武的自愧，被他们指为钦犯的人也绝少抗争或辩诬。

多年之后，有了解内情的同学对我讲，当时班准备整肃的学生有二十多个，只是形势急转直下，才罢手的。

——那位科长，其实是一位很正直的学生，我们同住一个宿舍，平时还是能谈拢的。他自尊心特强，而我有爱讽刺挖苦人的毛病，许多刻薄话大大伤害了他的自尊，他接受党团支部的指示向我开炮，我没有记恨他，因为是我先对不起他的。后来文革大乱，我和他在同一个战斗队。革委会成立，军宣队让犯了严重路线错误的学生人人过关。在我做检查时，和许多人对我进行声色俱厉的批评相比，科长对我使用的言词相当温和。毕业分配后我们各奔东西。九五年我独自旅游到陇东，特地去拜访他。老同学久别重逢，一笑泯恩仇。我们秉烛夜谈，又在雨中小镇漫步，谈古论今。不过我们对苦涩的往事避而不提。他在一所设在乡间的正规中学任教，脾气倔强，傲骨嶙峋。他一辈子不当官，但却是民间有声望的人。他们那里老人死了，要用一个字概括和考评他的功业和为人，这个字极其重要，事关逝者的名声和家人的荣誉。但如果瞎吹嘘，也会遭耻笑，所以必须由学识渊博而且公正无私的乡邻决定。我们这位同学，就当之无愧地担当着这重任。

文革彻底的改掉了我说话尖酸刻薄、好讽刺挖苦人的大毛病。甚至我自己都没有发现这种变化。到省城定居后，人们注意到我对大院子里的三岁小孩，说话都非常谨慎、客气；最重的话也不过是“多乎哉？不多也”。

国际统一刊号 ISSN 1 0 2 1 — 8 6 0 2

投稿专用地址: [tougao@cnd.org](mailto:tougao@cnd.org) 其它事项请电邮: [cnd-cm@cnd.org](mailto:cnd-cm@cnd.org)

如需有关《CND》和《华夏文摘》各种免费期刊和服务的信息, 获取

中文文件: [hxwz-info@cnd.org](mailto:hxwz-info@cnd.org) 英文文件: [cnd-info@cnd.org](mailto:cnd-info@cnd.org)

《华夏文摘》万维网服务站(WWW)地址: <http://www.cnd.org/>

---